

「世界化」與「全球化」中的國際關係研究： 連結「全球歷史社會學」與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對話

郭雪真*

摘要

國際關係研究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國際關係研究，有些學者質疑為何沒有非西方觀點的國際關係研究，遂促使出現更多非西方或後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從亞洲學派開始以本土成長的理論化，進行國際關係理論的世界化與全球化歷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遂出現了「本土成長轉向」或「後西方轉向」，主張國際關係理論應該脫離西方的觀點，以本土成長或後西方的觀點發展國際關係理論。藉由廣泛地檢視及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要發展非西方或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是「去除（歐洲）中心化國際關係」或「世界化國際關係」，進而推動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既有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或「全球歷史社會學」理論批判西方歐洲中心主義、西方與非西方權力不對稱，主張各文明之間對話、全球社會轉型與分殊化等基本概念與觀點，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反思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後設理論觀點，吸納非西方歷史社會的經驗與觀點，顯示其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相同主張，作為探討連結兩者對話的基礎，以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西方歐美、非西方、後西方走向全球研究層次的內容發展。

關鍵詞：全球歷史社會學、全球國際關係研究、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及建議，以及 Barry Buzan 教授以 email 提供寶貴意見，本文曾接受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145-002），特此致謝。

*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sckou@msn.com

收件日：2020 年 10 月 5 日；修正日：2020 年 12 月 6 日；接受日：2021 年 2 月 17 日

The Worlding an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nect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sueh-Chen Kuo*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is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R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centric world politics. Some scholars have questioned “why there is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has promoted more scholars to provide more Non-Western or Post-Western approaches into IR. Starting from the Asian School with homegrown theorizing, the IR is ongoing a worlding and globalizing proces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 Therefore, there is a “homegrown turn” or “Post-Western turn” in the IRT, to advocate IRT should break away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s and to develop on the homegrown, local or post-western perspectives. Scholars widely reviewed and criticize the Western IR, not only searching for building the Non-Western IR which has always been existed in, but also developing the Non-Western or Post-Western IR, or decentering IR or (re)worlding IR, to promote the GI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IRHS) or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GHS)’s basic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such as critique the Western Eurocentrism, the unbalance of power in the West between Non-West, the dialogues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global society, to connect the dialogue between GIR and GHS to exte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R, from the Western, Non-Western, Post-Western toward to Global levels and contents.

Keyword: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R.O.C.). E-mail: sckou@msn.com

壹、前言

國際關係研究以主權國家為研究核心，是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 之後，西方歐洲現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歷史社會為依據，學者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仍是以歐洲歷史為依據 (Knutsen, 2016)。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源於西方(歐洲)的國際關係實務，也是基於西方國家的歷史社會發展而理論化，致使產生西方主導國際關係理論的問題，西方國際關係的觀點與實務是普遍的國際關係標準 (Acharya, 2014b)，即是以「威斯特伐利亞歐洲中心主義」(Westphalian Eurocentrism) 為基礎 (Kayaoglu, 2010)，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也適用於非西方地區 (rest)。國際關係研究遂以歐洲為中心，忽略了其他非西方歐洲國家的歷史社會及其發展過程。國際關係學科也就並不是那麼「國際」了，而是歐美西方或美國主導的學科 (Weaver, 1998)。國際關係學科並未反映世界上絕大多數社會與國家的聲音、經驗、知識主張及貢獻，並且經常邊緣化西方核心國家以外的國家 (Acharya, 2014a: 647)。主要是美國、盎格魯地區及少數歐洲國家學界為核心，決定了學科的研究與知識，其他地區國家則就不重要 (Tickner, 2003: 300-309; Tickner & Waever, 2009: 335)。

國際關係研究實際是「歐洲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或「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但學者質疑「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Acharya & Buzan, 2010) 或是「誰的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2014b)，遂出現探討「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¹嘗試從非西方地區國家的歷史社會中發展出本土成長的 (homegrown) 國際關係理論，出現了「本土成長轉向」或「後西方轉向」，強調國際關係理論應該脫離西方觀點，以本土當地或後西方觀點發展國際關係理論 (Ikeda, 2010; Kuru, 2018)。藉由不同的本土思考超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區分，「世界化」(worlding) 和「全球化」(globalizing) 國際關係研究，以發展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或是「國際關係的全球研究」(Acharya, 2014a; Hurrell, 2016; Peters & Wemheuer-Vogelaar, 2016; Tickner & Blaney, 2012)。「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意圖突破國際關係研究以歐洲為中心的後設理論(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理論與實務之限制，引入非西方觀

¹ 國際關係學者並未完全同意使用「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因為無論西方或非西方都不是同質的概念，學者也就不同意使用西方與非西方為對照用詞，遂使用西方與其他 (West vs. the Rest)、第三世界、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底層的 (subaltern)、後殖民的或後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但仍是無法獲得共識 (Acharya, 2011: 621)。

點發展多元的國際關係研究，發展普遍運用的國際關係知識。即是藉由本土成長的理論化擴展國際關係的世界，使國際關係研究成為全球的學科 (Aydinli & Biltekin, 2018a)。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是理論，而是理解與重塑國際關係學科的方式 (Acharya, 2016: 6)，但僅納入非西方歷史社會經驗或國際關係理論是不足以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理論，亟需充實後設理論的主張，以展現其理論的反思性及未來發展方向。在「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倡議之前，「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就批判既有國際關係理論的「非歷史主義」(ahistoricism)、²西方(歐洲)中心主義，強調國際關係研究國際體系長期變遷過程的全球性、國際性、歷史性與社會性(郭雪真，2013；Go & Lawson, 2017)，促使學者批判西方而提出「非西方」或「後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尋求超越西方觀點的「國際性」(Bilgin, 2010)。「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批判西方歐洲主義、認為西方與非西方權力不對稱、強調文明對話、全球社會轉型與分殊化等基本概念與觀點，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反思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後設理論觀點，³吸納非西方歷史社會的經驗與觀點，顯示其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相同主張，足以作為探討連結兩者對話的基礎，以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西方歐美、非西方、後西方走向全球研究層次的內容發展。

貳、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化歷程：從亞洲學派開始到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出現「後西方轉向」或「本土成長轉向」始於學者質疑「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因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已經發現理解國際關係的正確路徑、獲得論述霸權的地位、隱藏了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當地(歷史、文化、政治及制度)狀況不符合國際關係理論結果，以及西方與非西方研究資源差距等原因，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遂主導了國際關係研究 (Acharya &

² 即是「現時崇拜主義」(chronofetishism)與「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rism)，前者指涉現在(present)只能以檢視現在而適當地予以解釋，可以忽略過去而不管；後者指涉理論者以前者(現時崇拜主義)觀點看待歷史，認為歷史時段是不連續且有差別(郭雪真，2013：70)。

³ 後殖民主義也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論點，其質疑西方國際理論產生的國際關係知識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西方國家在物質權力及知識生產上的霸權優勢，忽視第三世界及原住民的觀點，西方國際關係知識是霸權式獨白、先進的殖民主義，藉由知識、世界觀、觀念及呈現等理念因素而傳播及內化其(西方帝國主義)宇宙論的基本假定(Beier, 2005: 1-10)。

Buzan, 2010: 16-22)。但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而是在於國際關係理論對非西方思想的健忘性 (Shilliam, 2011: 1-10)。即是只以西方為國際關係知識的主體，忽略非西方歷史社會的發展經驗亦是知識主體。

「後西方轉向」遂重新引發國際關係學者批判及反思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從國際關係是否是以西方歐洲歷史發展為中心？非西方地區歷史發展是否有助於學科成長？要如何引入非西方的思想、歷史及傳統？但逐漸出現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浪潮，並不是要取代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而是要將非西方本土成長的國際關係傳統、概念與理論引進國際關係研究，希望增加更多的多元觀點，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Aydinli & Biltekin, 2018a)。遂從亞洲學派及各國學派倡議開始發展「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即是國際關係的「世界」不再只是「西方世界」，而是擴展到「非西方世界」，進而以「世界」與「全球」涵蓋國際關係研究的地緣知識範圍。

一、亞洲學派及亞洲各國學派的倡議

2007年*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期刊出版「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亞洲的觀點與反思」論壇專輯，專輯主編Acharya 和Buzan從亞洲的觀點探討與批判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以西方歷史發展為中心，誤認與誤解大部分的世界歷史；以西方發展的國際關係理論普遍解釋及理解非西方地區的國際關係，缺乏非西方地區當地的關聯性及資源；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地位妨礙了非西方地區建構國際關係理論，亞洲的國際關係研究是沒有理論的 (Acharya & Buzan, 2007b)。他們重申其目的不在確認或提倡國際關係的亞洲學派，而是能否以亞洲作為國際關係研究通則化的基礎，並有意義地表達國際關係理論與人類經驗之間的脫節 (Acharya & Buzan, 2010: 229)。根據Acharya的說法，就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虛假的普遍主義，與非西方世界實況脫節，以及拒絕非西方社會的行為主體性等四項偏見 (Clifford, 2011)。自此建構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不僅在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引起關注，也在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引起反思。

Acharya & Buzan (2007a) 也探討亞洲出現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是否有意義、是否能促進國際關係學科發展，並主張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主導了亞洲，當地條件或文化障礙或是複製西方，歧視或阻礙了發展國際關係理論；他們認為隨著國際關係研究逐漸成為學界學術教學與研究已全球化的主題，並且也不是單一的全球對話，而是各種不同地理區域之間的對話，西方與非西方皆不是同質的範疇，皆涵蓋相當範圍的各種途徑；國際關係理論若有完全的轉

型，是較可能會來自結合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各種辯論的內在動力與其對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所輸入而成。在他們的推動下，國際關係學者也就紛紛提出「有沒有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Shimizu et al., 2008)、「為什麼沒有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Qin, 2007)，或是「有沒有印度的世界政治思考傳統」(Mallavarapu, 2009)，或是以「解除(歐洲)中心化國際關係研究」、「世界化國際關係研究」或「解除殖民國際關係研究」(Jones, 2006; Tickner & Waever, 2009)為訴求，遂基於不同的歷史與哲學傳統所實踐出不同的國際關係原則，出現具有國家性、當地特色的本土或地方性學派(各大洲、區域、國家、城市)(石之瑜，2010)或研究機構學派，例如亞洲學派、中國學派、日本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京都學派、清華學派等等，⁴藉由與美國學派或主流學派的對立關係而創新理論觀點(Zhang & Kristensen, 2017)。

尤其是中國學者具有強烈的建立中國學派意識，從有無之爭、名稱之爭到方法之爭，不僅在其國內國際關係學界，也在國外國際關係學界推動中國學派運動(王江麗，2013；Peng, 2019)，以中國傳統的朝貢制度、先秦思想及天下思想發展具有「中國特色」或「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研究(秦亞青，2005；Qin, 2016b; Zhang & Chang, 2016)，或是以「關係」、「關係性」及「關係平衡」概念發展「關係的國際關係研究」(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Kavalski, 2017; Qin, 2018; Shih, 2017)或是以整體關係主義發展的「和合(共生)主義」(余瀟楓、章雅荻，2019)，以及以道義權威王權國家發展而成的「道義現實主義」(Yan, 2019)。換言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需要「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為大平臺，以展現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的原創性知識生產(秦亞青，2020)，推動其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與研究。

Qin (2009) 參考Jackson & Nexon (1999) 運用過程關係社會學的過程關係探討世界政治變遷中行為主體與結構關係的建構主義，發展出其關係理論，亦即是社會過程中的關係和關係中的行為主體，就以「關係性」與「過程」發展出其關係本位的「過程建構主義」，並將(社會)過程定義為運動中的(行為主體間)關係，論證(社會)過程的自在性、過程動力和過程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及影響。秦亞青較以文化理論為論述依據，主張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國際關係)實踐，遂聚焦於社會理論的背景知識、實踐社群及文化社群而成為文

⁴ 中國學派泛指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所建立的理論學派；清華學派指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所建立的理論學派；日本學派是泛指日本國際關係學者所建立的理論學派；京都學派是指京都大學哲學學者所建立的理論學派。

化理論（即是其關係理論），詮釋多重文化的世界 (the multicultural world) 為各種關係所構成的世界 (a world of relations)，強調關係治理 (relational governance) 的論述與實踐，藉以建構其「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Qin, 2018: 3-74)。

秦亞青（2015，2016；Qin, 2016a, 2018）後來將其過程建構主義改名「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再以改名「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為英文出版，此關係理論認為文化不同，其國際關係實踐也就不同，西方是以理性為實踐性，而中國是以關係性為實踐性，關係性是基於三項基本假定而發展：假定世界是人們相互聯的關係世界；假定實踐性知識和表像性知識互為表裡、內在統一；假定後設（元）關係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互為生命，和諧而非衝突才是社會的本原（體）狀態，並將其觀點翻譯成英文出版於西方學界，藉以與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話，進而與西方英美學者合作探討國際關係的關係性，甚至是以關係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政治關係理論。

我國學者石之瑜 (Shih, 2017; Shih et al., 2019) 以相對（或社會）本體論 (relational or social ontology) 假定先於國家存在之前的國際體系「關係性」，所謂關係性是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實踐、自我限制及雙邊為關鍵概念，超越以國際體系「無政府」(anarchy) 假定所發展的強國政治、歐美「一超多強」霸權式國際關係理論化，建立其「關係平衡」的「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新國際關係理論」。石之瑜和黃瓊菽也從中國儒學、印度佛教、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及歷史循環觀點發展其「關係平衡」理論 (Huang, 2015; Shih & Huang, 2014: 9-24)，關係平（均）衡是指國家行動與決策的最高原則或重要前提，在於雙邊關係的維持與穩定，為此可以自制而放棄立即而明顯的利益，以降低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感及不安全感，確保雙邊的關係安全 (relational security)。

Pinar Bilgin (2020: 12) 就說：「我如何學習停止擔心『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並愛上了它。」這不外乎是她希望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地緣知識版圖，發展非（後）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理論，提升國際關係研究知識的普遍性，而成為「世界的或全球的」國際關係研究。

二、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倡議

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從非西方的歷史社會發展其概念與理論，藉以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的歐洲中心主義而成為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例如 1960 ~ 1970 年代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及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 theory) 正是由非西方觀點批判西方歷史發展及理論，嘗試提出非西方的國際關

係理論 (Cardoso & Faletto, 1979; Wallerstein, 1974)。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可以視為是要打破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 (西方) 帝國主義，以建立特定區域或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 (Shahi & Ascione, 2016)；藉由聚焦於超越國際關係理論的西方偏狹主義 (Parochialism)，思考發展「後西方國際關係」(Inayatullah & Blaney, 1996: 65-84; Shani, 2008; Shih & Yu, 2015) 或非西方國際關係 (Shilliam, 2011)。於是藉由本國的歷史、文化及哲學觀點提出「非 (後) 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理論化建構其「非西方或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一) 非 (後)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化

首先，在非西方國際關係傳統、概念與理論上，引用非西方世界的哲學觀點作為知識論基礎，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Tickner & Blaney, 2013)，例如佛教 (Acharya, 2011)、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原型論」或「古層論」或「執拗低音」(*basso ostinato*) (Rösch & Watanabe, 2017)、中國名學家公孫龍 (Shih & Yu, 2015)、阿拉伯思想家Ibn Khaldun (Yalvaç, 2016: 77-103)、非洲的「集體人性」(*ubuntu, collective personhood*) 價值觀 (個體的存在是因為整體的存在，個體與整體是共同存在) (Smith, 2018)，思辨西方國家發展出的「現代性」及其國際關係，彰顯其後西方關係的觀點。或是運用日本京都學派西田喜多郎的世界歷史觀及「無的處所」(*place of nothingness*) 哲學、再世界化及中國學派的「關係平衡」等三種國際關係理論化途徑，並以釣魚臺爭議為例，嘗試以「無的處所哲學」建立科學的經驗研究，超越西方以利益和權力的理論化途徑 (Shih, 2017)。乃至結合印度的「不二元論」與中國道家的「三元辯證法」(*trialectics*) 探討世界政治的本質，認為不是只有一個世界而是許多多重世界共存 (*a pool of multiple worlds*) (Ling, 2018)。

其次，或是強調本土成長的國際關係理論化，例如以西方歐洲為中心及當地為邊陲的概念探討當地的國際關係研究，藉以呈現不均衡的學術研究狀況，認為唯有以本土成長的理論化才能獲得中心國際關係學科的尊重 (Aydinli & Mathews, 2008)。本土成長理論化就是以邊陲地區觀點原創理論化邊陲 (國際關係研究)，藉由本土知識或哲學而發展的「參考式」(*referential*)、轉化西方觀點反映本土特定社會而發展的「轉化式」(*alterations*)，以及發展原創概念普遍適用而發展的「真實式」(*authentic*) 等三種方式為理論化途徑，以獲取全球國際關係學界接受、相互接觸與成長 (Aydinli & Biltekin, 2018b)。也可引用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探討本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藉以解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殖民，例如甚至引用拉丁美洲學者的殖民知識論，解除泰國國際關係理論受到西方知識論的殖民，即

是以多元多樣的知識論觀點批判及接受西方哲學觀點，發展泰國的國際關係理論 (Supachalasai, 2017)。甚至是以知識、學者及理論三個層面探討既有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失敗教訓，作為發展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早期預警機制；並說明本土成長理論化的意義與內容，提出其發展的步驟 (Kuru, 2018)。或是從「培植概念」(conceptual cultivation) 進行本土成長理論化，藉由概念形成、概念建構而建立理論，以當地的概念發展適用於當地脈絡的理論 (Ersoy, 2018)。例如以伊斯蘭觀點進行國際關係理論化，包括認為伊斯蘭教義是獨特的真正理論，適用於國際關係，伊斯蘭法理作為理解國際關係的基礎，以及現代國際體系是伊斯蘭所未有的經驗，要以人類理性來指引 (Moshirzadeh, 2018)。甚至比較伊斯蘭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異同 (Nuruzzaman, 2018)。或引入伊朗13世紀伊斯蘭教「蘇菲（神秘）主義」(sufism) 學者的詩作，建立本體論非物質主義、知識論一元主義及方法論折衷主義的非歐洲中心全球國際關係理論 (Shahi, 2019a)。或是以印度政治家Kautilya的著作《政事論》(Arthaśāstra) 作為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來源，建立印度的現實主義理論 (Shahi, 2019b)。但引用哲學思想與歷史知識的本土主義發展國際關係理論，這是非理論的並有政治疑問的，不及「政治現代化」對（印度）發展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 (Mishra, 2014)。

最後，也可以探討研究「前現代的非西方國際關係」(pre-moder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探索在現代西方出現前的非西方國際關係。早在1960年代，就有學者已經關注此議題，例如以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及核心議題（權力、軍國主義與戰爭、國際法與和平協議），比較檢視1945年前的西方、1950～1960年代的西方，以及前現代非西方的中國帝國、印度的印度教及中東穆斯林社區等非西方地區的歷史發展及思想 (Larus, 1964)。甚至是以空間與時間的分殊化探討古希臘時代希臘人與非希臘人之間的國際關係 (Rood, 2010)，或是以朝貢體系探討古代中國與東亞國家間的國際關係 (Zhou, 2011)，或是以中國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爭霸策略探討鬆散層級國際體系下的大國崛起與爭霸 (周方銀, 2012；徐進, 2012)，或是以國際政治思想探討先秦國際體系的形成與演進 (余麗, 2010)。

以非西方世界的歷史、社會及文化作為本土成長的國際關係研究，已是發展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路徑了。但是有來自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來源，並不意味著就會有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畢竟本土主義本身也是受限於其地緣範圍之內，外界更難以理解此本土的各哲學觀點，也就是另外劃出了地緣知識界線；而且不同地區的國際關係學者也會有不同的發展態度及狀況。

(二) 不同的發展態度及狀況

在發展本土成長的國際關係理論上，國際關係理論遂出現各種以國家或地區為名的「學派」，例如「法國學派」、「義大利學派」(Femia, 2005)、「澳大利亞學派」(Cotton, 2013)「中國學派」或「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Kim, 2016)。聚焦於非西方區域的「世界區域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 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以及研究「已被解除西方化的」全球秩序 (Voskressenski, 2017)，皆是展現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已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趨勢之一。但各國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是否都致力於發展本土理論化，還是致力於複製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對此存在著不同的發展態度，在建立當地理論觀點上，北京學派（即中國學派）蔚然成形、日本「京都學派」具豐富思想基礎、德里學派（印度學派）缺乏學派意識、雪梨學派（澳洲學派）尚難樂觀、首爾學派（韓國學派）依附歐美理論、東盟學派（東協學派）尚早、臺北學派缺乏自身思想理論（石之瑜，2010）。

本土成長學派就是在以其國家特色的觀點從事學術研究，但是否仍是複製或模仿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觀點運用在本國，則是各學派需要反思的議題。例如中國學派從學習、批判及修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例如道德現實主義以中國古代的道德思想修正結構現實主義、關係理論以關係取向的中國社會實踐模式修正實踐轉向的建構主義等，都不是原創的理論創新，面臨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內部邏輯不一致問題，甚至是出現「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 妨礙了理論創新及缺乏 (Peng, 2019)。韓國學派也是如此，大多數學者仍是依賴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少數以後殖民主義觀點發展本土理論 (Min, 2016)。國際關係理論普遍性與韓國歷史經驗特殊性之間的不平衡，需要尋求連結兩者的平衡 (Choi, 2008)。

此外，印度學者擺盪在質疑主義與冒險主義之間，質疑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在印度仍是受害者，因為學者對理論不熟或不感興趣；冒險者認為印度學者有很大的潛能發展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但不是參考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就是不被西方學者接受，陷入兩難之中 (Shahi & Ascione, 2016)。為了突破國際關係西方知識論的帝國主義，國際關係的知識論基礎必須擴展，就是必須超越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科學主義偏見及主客二元的觀點，例如以印度哲學的「不二元論」(Advaita) 或「非二元的一元論」(Advaitic monism) 做為知識論基礎，即是「非二元性」(non duality) 或「非第二性」(non-secondness) 的一元知識論基礎，不是分開分別的存在，而是融合一起存在，存在著被隱藏的單一關聯性。此關聯性是最終的全

球真實性，要以此關聯性分析全球各組成分子之間的多元差異性，以揭露跨越此多元差異性所被隱藏的關聯性 (Shahi, 2018; Shahi & Ascione, 2016)。或是以伊斯蘭教「蘇菲（神秘）主義」觀點，建立本體論非物質主義（非存在是多元存在的來源）、知識論一元主義（真實的同一性）及方法論折衷主義（自我與他人的融合）的非歐洲中心全球國際關係理論 (Shahi, 2019a)。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亞洲本土經驗之間的交織作用，有助於國際關係學界的對話，擴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Eun, 2019: 70-87)。但從亞洲引入觀點及非西方學者提出本土觀點，成為各式各樣的國家學派，是無法使國際關係研究更全球化。亞洲的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是現代西方的衍生論述，增強現有的地緣政治與文化不平等，應該朝向不會增強歐洲中心主義的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即是解除殖民化的國際關係理論，主張多元的本體論 (Chen, 2011)。例如石之瑜和余帛燦就以中國名家思想家公孫龍的觀點思辨西方國家發展出的「現代性」及其國際關係，彰顯其後西方關係的觀點 (Shih & Yu, 2015)。甚至以「文明過程」、「華人性」(post-Chineseness) 及「漢化」(Sinicization) 說明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發展，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迥然不同於以主權國家發展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Katzenstein, 2012; Shih & Yu, 2015)。簡言之，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必須先解除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以本土成長的歷史、思想、文化及環境發展出當地的國際關係研究及理論。Acharya 和Buzan的亞洲學派倡議就是面臨這樣的問題，影響其後續發展而提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倡議。

三、亞洲學派倡議後的十年反思

2017年，Acharya 和Buzan檢視十年來的亞洲國際關係文獻及其貢獻，提出更新、重新聚焦及挑戰，以有助於建立「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 Buzan, 2017)。他們指出過去十年，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仍集中在西方（尤其美國）、中層理論 (middle-range theories) 漸受歡迎、以西方為中心的建構主義興起，以及美國及西方仍主宰國際關係理論，即是西方中心主義更甚於以往 (Acharya & Buzan, 2017: 343-348)。Acharya (2017) 認為亞洲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乃是非常依賴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建構主義），大學與研究機構也不重視理論研究，理論的「本土化」仍有限，而且學界與政界之間的密切關聯阻礙了理論研究，但已逐漸有所改善。Acharya和Buzan遂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啟發，藉由「不平等混合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的觀點、理論與歷史之間共同組成關係、「全球國際社會」觀點，探索而提倡從「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而聚焦「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 Buzan, 2017: 348-355)。

他們的後殖民主義觀點正是「全球歷史社會學」觀點，藉此將其倡議的「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及「亞洲學派」提升至「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並於2019年配合國際關係學科成立百年，將其之前「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相關的觀點及Acharya (2014a) 的觀點彙整成書出版 (Acharya & Buzan, 2007a, 2007b, 2010, 2019)，完整地呈現「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主張（詳見於後）。他們認為亞洲學派的倡議未能脫離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仍陷入西方與非西方的類別爭論，遂倡議聚焦「全球國際關係研究」，這是他們脫離或超越「西方」、「非西方」及「後西方」分類範疇爭論的終南捷徑了。

參、「西方」與「非西方」類別的爭論及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倡議

當Acharya和Buzan提出「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亞洲學派」時，連帶也捲入長期「西方」與「非西方」二元對立分類的爭論，有些學者則提出「後西方」的類別避免二元對立的爭論。1980年代國際關係學者就以地緣知識論或地緣文化知識論探討國際關係學科研究發展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形，或是思考其知識論所隱含的地理基礎，認為歐洲地區或盎格魯薩克遜 (Anglo-Saxon) 文化主導了國際關係學科發展 (Alejandro, 2017; Tickner & Waever, 2009)。但國際關係理論追求另類的文化觀點，關鍵不在它的地理背景而是理論本身的一致性，能否有效地處理當前全球政治所存在的問題 (Gardner, 2015)。

Acharya和Buzan遂廣泛地檢視及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不僅要尋求建立始終存在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也要發展非西方或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進而推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 (Acharya & Buzan, 2019)。「後西方轉向」遂以「非西方國際關係」、「後西方國際關係」、「超越西方國際關係」及「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出現在學術研討會、期刊論文及書籍，顯現出國際關係理論出現「全球（化）國際關係研究爭論」 (Global [izing] IR Debate)，尋求國際研究更分歧與多元的地緣知識論 (Wemheuer-Vogelaar & Peters, 2016: 1-28)，但也招致批評其仍是建立在不完整閱讀國際關係研究的批判之上，並且誤以為國際關係研究知識的全球普遍性，以及誤以為世界各地學者都嚮往及能夠貢獻於建立單一的知識，忽略了權力與財富分配對此全球想像的影響 (Anderl & Witt, 2020)。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出現，不僅顯示出國際關係學者意圖擴展研究的地理疆界，從「全球西方」、「全球北方」而到「全球南方」及「全球東

方」；也顯示出學者自我反思研究的後設理論基礎，是從批判西方歐洲中心開始，再到非西方與後西方，最後到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研究。

一、「西方」、「非西方」與「後西方」類別的爭論

國際關係研究能否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但有西方國際關係論述就會有非西方的論述，或批判西方論述的後西方論述出現，甚至出現反「非西方」的論述。不僅在界定西方與非西方的地理空間有所爭議，也陷入此分類背後的意識形態爭論，即是反西方世界國家的意識形態（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非西方與西方的二分法意含著前者與後者之間負面的關係，以及前者保有（國際關係）真相與文化地理位置之間的連結，遂阻礙了國際關係研究的全球對話 (Hutchings, 2011)。「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是阻礙國際關係學科全球化的最重要障礙，並誇大了兩者之間的異同，致使難以明確釐清所指涉的內涵 (Jorgensen, 2018: 73)。因此，界定「西方」與「非西方」是件困難且危險的事 (Peter & Wemheuer-Vogelaar, 2016: 4)。

倡議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大多數學者，並未從本體論及知識論上質疑其所採用的國際關係概念及議題，反而以歐洲中心的社會科學觀點重製了西方中心主義 (Sune, 2016)。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西方性」與「非西方性」都是「目的論的西方化」的假定，甚至隱含支持美國的政策制定 (Bilgin, 2008)。或是以「後西方」取代「非西方」，以呈現兩方之間的交織及相互構成的互動網，即是兩方的關係性，此關係性有助於略述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是各種理論觀點爭論的場域，也是對話學習的空間 (Kavalski, 2018)，即是西方與後西方並非對立存在，而是相互構成而存在。

非西方與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是有所差異，「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是要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則只是尋求知識來源的起源，兩者皆有其用途，也有使西方再中心化的危險，因為兩者皆蘊含了西方的意涵，兩者混合也相互蘊含，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也包括研究西方「再世界化」的歷史 (Shih, 2018: 108-109)。例如以《孫子兵法》一書在盎格魯文化地區受到戰略研究的歡迎為例，說明西方「再世界化」的三條路徑，西方與非西方相互提供對方不同的資源協助對方再世界化 (Shih & Hwang, 2018)。乃至若要超越西方與非西方二分法，從事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也不必然要從事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研究意圖決定了本土成長理論化的類別與運作 (Shih, 2018: 109)。

然而，西方與東方、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都代表著依據歐洲帝國的想

像而區分，即使「後西方」也仍是源於此帝國想像而來，加入非西方的觀點反而造成世界政治研究的族裔化，即是依據族裔與文化差異的本質化建構所想像的分裂世界，以及所產生的知識，故應以「後帝國」取代「後西方」，反思國際關係學科知識產生史的帝國權力，而強調歷史與關係的研究及知識共存的邏輯 (Murray, 2020)。發展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不應將各地的國際關係理論予以地方化，應該是以後殖民主義批判既有的歐洲帝國主義知識論，重新概念化及再活化而發展靈活開放的普遍主義 (Vasilaki, 2012)，特定地方或本土的理論化皆能發展普遍的國際關係理論，即是所謂的「多元的普遍主義」(Acharya, 2014a: 647)。發展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即是從尋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非西方世界之間的相關性，擴展到尋求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世界的相關性，以提升國際關係理論的普遍適用性而成為普遍理論。

Acharya使用「非西方」一詞是基於方便而無特定的意識形態，也能用以探討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早已主導及盛行的「西方」概念，而非二分法 (Acharya, 2011: 621)。但如上述所言，國際關係學者仍陷入「非西方」與「後西方」類別的爭論，他遂提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超越「非西方」與「後西方」類別，主張國際關係研究的未來應涉及多重交疊的對話，不同理論途徑及知識論途徑之間的對話，即是跨越理論與知識論的區隔，以多元主義及折衷主義挑戰主流理論的種族中心主義，使其更為擴展與包容 (Acharya, 2015)。「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就是在回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Eun, 2018: 1-16)，要以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多元觀點而非二元對立觀點，超越西方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二、超越西方與後（非）西方爭論的「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倡議

Acharya遂於2014年擔任「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會長，在年會的會長演說中，提出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計畫，以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及其他地區國際關係研究的區隔。此計畫有六個主要面向：多元的普遍主義、奠基於世界歷史、重新界定現有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並從各社會及文化的國際關係研究知識建立新理論與方法）、整合區域研究及區域主義為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關注議題、不論其來源及形式避免種族中心主義及例外主義，以及承認較寬廣的具有物質元素與理念元素之行為主體性（包括對全球秩序的抵抗、規範行動及本土的構成）(Acharya, 2014a)。他敦促「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從世界歷史發現各種新模式、新理論及新方法；分析西方主導的200多年後權力與理念分布的變化；以完全多元性及相互關聯性探索各區域的世界；從事需要國際研究學科與區域研究知識深度及實質整合的主題及方法；檢

視理念與規範在全球與本土之間流通；調查文明之間更多的相互學習之歷史證據 (Acharya, 2014a)。他指出，建立「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是要建立「一個通用的研究途徑」(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而是承認世界的多樣性，尋求共同基礎解決衝突 (Acharya, 2014a: 647)；「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目的是鼓勵不同觀點之間的辯論與對話 (Acharya, 2016:14)。

2015年「國際研究學會」年會更以「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為主題，計有307篇論文探討，約是全部論壇及場次論文的四分之一 (Acharya, 2016)。該學會官方出版品*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在2016年的第18卷第1期，也出版「國際研究學會會長專題」專輯及論壇探討「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相關議題。誠如Acharya所言，「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辯論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及西方主導了國際關係學科，要能體認非西方人民與社會的地位、角色與貢獻 (Acharya, 2016)。例如關注被邊緣化的全球南方拉丁美洲觀點 (Deciancio, 2016)，提出全球南方觀點走向「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路徑圖，使其能從本土走向全球 (Gelardi, 2019)。

在Acharya的會長演說之後，2014～2018年期間，「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著作持續增加當中，從每年30～40篇而增加到每年140～150篇 (Kuru, 2020: 3-5)。Acharya和Buzan在2019年檢視國際關係學成立百年 (1919～2019) 以來，國際環境情勢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關係，尤其是1989年冷戰後單極、全球化、非西方興起及多元的後西方世界秩序，使國際關係研究更為競爭的且鑲嵌的多元化而朝向「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 Buzan, 2019)。

他們歸結百年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當前仍是歐洲中心主義、沒有普遍理論、種族主義、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非西方世界脫節、拒絕非西方的行為主體性，也釐清「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並不拒絕「非西方」或「後西方」，而是要超越此源於對照「西方」的分類；它不是理論或研究方法，也無法解決國際關係理論典範之間的爭論，也不期待國際關係學界對理論或研究方法有一致的對話，而是提出其奠基於多元的普遍主義、世界歷史、納入而非取代既有國際關係理論與研究法、整合國際關係研究與區域研究、放棄只以國家與文化例外主義為基礎的概念與理論、承認多重形式的行為主體性；它不僅以財富權力文化權威分布，也以相互依賴及共同命運回應世界的全球化；它更規劃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研究議程，例如從各世界歷史發現新模式理論與方法、研究西方主導世界200年前的權力與理念分布及變遷、探索各區域世界的多元性及相互關聯性、接觸國際關係學科與區域研究知識整合所需的主題及研究方法、檢視

理念與規範在全球及地方層次之間的流通過程、研究文明之間相互學習的歷史 (Acharya & Buzan, 2019: 285-320)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雖不是一個獨特的理論或研究方法，但它挑戰由美國及西方學界所設定「國際關係研究」現有的界線標記，以作為提升「國際關係研究」朝向一個真正窮盡及普遍的學科 (Acharya, 2016)，國際關係研究若要跟上正在興起的後西方世界秩序，就需要繼續此全球化運動 (Acharya & Buzan, 2019) 或是國際關係的全球研究 (Hurrell, 2016)。「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是以文明為研究中心，聚焦於其他非西方國家在歐洲主權國家出現之前的歷史社會文明，遠較現代主權國家發展早了4,500多年；如何能說西方主導了國際關係研究，在1648年之前，非西方文明的發展主導了當時的世界發展，例如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文明。在「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趨勢下，學者也開始關注為何非洲被國際關係研究邊緣化的原因，以及其意義與啟示，提供非洲地區的觀點或建立「泛非洲學派」，使國際關係研究納入非西方的觀點及文明 (Bischoff, Aning & Acharya, 2016)。例如以Julius K. Nyerere的「獨立自力更生」(Uhuru na Ujamaa,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概念發展非洲社會主義社群，促進「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理論化 (Bentil, 2020)。

簡言之，它不是理論，而是分析架構及觀點，它是以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多元觀點，嘗試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尋求突破地理區域及文明隔閡而發展普遍的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將邊緣的理論觀點納入對話之中，展現國際關係概念與理論的全球性（包括起源與適用、時空環境）。即是「製造當地脈絡的全球知識」，促使學者參與政策世界提供建議及實踐 (Kaczmarek, 2020)。除了上述的非西方與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方法外，更強調全球歷史研究方法，關注各地區的歷史社會發展。

三、「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研究法——全球歷史研究法及其他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既有的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外，推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也就分別提出研究建議，意圖擴展此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例如強調全球歷史研究法，Andrew Phillips (2016b) 認為從1500 ~ 1750年現代時期初期的全球（世界）歷史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可或缺的歷史資源，當時的現代性是多重的且相互緊密關聯，而非只有西方才是現代性的先驅者，全球歷史的行為主體性是多重的，歐洲與非歐洲強權在西方殖民前及期間都是有其滲透性，在其區域內發展成現代性的中心。現代性是多元及多重的，而且相互之

間的歷史是有相關聯的，西方國際體系的擴張或歐洲殖民主義是西方與當地買辦廣泛合作的結果。20世紀中期前的世界政治是由各區域的帝國發展出的異質性，而不是由西方主權國家發展出的同質性，以帝國取代主權國家說明國際體系的擴張才符合全球歷史發展實況，不僅使國際關係研究更符合歷史紀錄，也更珍惜前全球秩序的新奇、脆弱及潛在的暫時性 (transience) (Phillips, 2016b)。

此外，Pinar Bilgin進一步提出「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 作為發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研究方法、精神 (ethos) 及隱喻，即是以此方法理解交錯重疊的（全球）歷史性、以此精神提升對位認知意識理解國際關係及提供解釋不同觀點發現之支撐的精神，以及以此隱喻思考「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既是區域的研究也是全球的研究 (Bilgin, 2016a)。例如以拉丁美洲區域主義與區域整合化過程的經驗納入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藉由探討其區域主義的區域性、性質、根基、形式與運作，尤其是國家在外交政策經濟發展的自主性，以作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區域研究途徑 (Deciancio, 2016)。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涉及到不同語言的運用與翻譯，畢竟要吸納全球各種不同文化所發展的本土概念或觀點，以及將本土成長的理論擴展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學界，都涉及到使用語言及文化認知的問題。在英語主導的國際關係學界，追求本土成長的學者仍必須以英文發表在英美國家的「國際學術期刊」，或是自行或委託成立本土的英文「國際學術期刊」（例如中國的*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土耳其的*All Azimuth*、巴西的*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在英美國際關係學界發行。不僅如此，拜科技之賜，現今網路有不少翻譯軟體 (Google Translate、Microsoft Translator、Screen Translate、iTranslate、QTranslate) 可供下載使用，協助學者理解其他語文地區或國家的文獻，進而強化不同語文的文獻傳遞與交流，有助於「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擴散。雖然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已有相當進展，但涉及當地語言環境的語意時，線上翻譯軟體的翻譯品質仍待加強。在擴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上，國際關係學者或許可以借鏡Thomas Kuhn在處理不同典範 (paradigm) 之間的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 時，發展出辭典 (lexicon) 或辭彙結構 (lexical structure) 的概念，藉以理解語文在不同的意涵 (方萬全, 2001)，或是製作辭彙表 (glossary) 說明不同語文之間的語意差異。語意差異不僅是涉及翻譯的問題，而是涉及辭彙轉變 (inflexion) 的問題，尤其是轉譯辭彙的轉變更為複雜，常會有衍生或派生轉變，已經脫離原意。當要引用其他語言文字或辭彙概念於本土脈絡，或是要將本土辭彙概念推展到國外，就必須審慎地探索此辭

彙的字源及語義，以免錯誤理解及詮釋。目前常用的方式是將本土概念以音譯的方式，例如中國學者發展的「關係」概念，音譯為Guanxi，而非只是以英文relationship、relations relationality說明其意涵。同樣地，英文概念的轉譯或翻譯也是需要更貼近本土語意的辭彙。這都需要國際關係學者發展學科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說明該概念的字源與語意，以有助於不同語文學者之間的對話。

綜合上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仍是「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進階版，希望超越分類範疇的爭論，藉由學者理論對話及相互學習，嘗試以區域研究與文明研究擴展國際關係研究的範圍與深度。這樣的研究發展趨勢正與「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擴展成「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相同 (Go & Lawson, 2017)。「全球歷史社會學」不僅批判西方歐洲中心主義，也意圖補救歐洲新主義 (Bilgin, 2016b)，嘗試以世界歷史的觀點探索國際關係，藉由「全球轉型」(Buzan & Lawson, 2015)、「文明過程」、「文明之間關係」(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Hobson, 2004, 2007b) 呈現國際關係的「國際性」及「全球性」。即是除了西方歐洲地區外，非西方歐洲的地區對於當代國際關係或「現代性」或「全球性」也是有影響及貢獻，現代性或全球性是多重的，是文明化過程的擴散 (Phillips, 2016b)。由於「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是理論而是分析架構，需要深入的後設理論與實質理論。「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會是值得參考的理論觀點，兩者之間具有若干相同的對話論點，尤其Buzan在推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對話的關鍵角色，有助於以「全球歷史社會學」理論觀點連結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之間的理論對話。

肆、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全球社會轉型觀點與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

相較於「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而言，「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是國際關係理論，但屬於邊緣理論之一。它批判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非歷史性或歷史恐慌症，主張國際關係的歷史性與國際性，尤其在第三波的發展過程中，以「不平等混合發展」概念擴展國際性，發展出普遍適用於其他社會的歷史過程之理論（王軍，2007；汪宏倫，2011；余家哲、李政鴻，2009；郭雪真，2013；Go & Lawson, 2017）。它關注非（西方）歐洲國家的歷史社會性，鼓勵非歐洲的國際關係學者在學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時，應該關注其本國的歷史社會性，甚至其原先關注的國際性也逐漸發展成全球性，以全球歷史及跨國歷史的觀點超越地理國界，探索人類整體社會、全球社會或全球國際社會的轉型過

程，遂有學者將「國際歷史社會學」改為「全球歷史社會學」，藉以擴展「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所提供的批判西方歐洲中心論點 (Go & Lawson, 2017)。隨著全球化議題研究的趨勢，全球化已成為「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但由於「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基於不同的歷史社會學觀點（主要是馬克思式 [Marxian] 與韋伯式 [Weberian]），遂對於全球化及其研究有著不同的觀點。尤其是第二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充滿著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第三波又必須處理「國際性」理論化，面對「全球歷史社會學」的發展也有爭論（郭雪真，2013，2019）。即使如此，隨著研究議題擴展及深入全球性，「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逐漸擴展成「全球歷史社會學」（郭雪真，2019；Spohn，2011）。這如同國際政治擴展成世界政治與全球政治，「國際關係研究」擴展成「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皆是由於針對全球化研究議題的擴展及學者反思的過程所致，「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論點足以連結「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此反思對話的過程。

一、批判西方歐洲中心的觀點

「全球歷史社會學」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使西方能統治世界，但資本主義起源不能只限制在歐洲，非西方社會也扮演著關鍵角色，資本主義整個發展是全球發展的過程，例如蒙古西征、發現新世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帝國殖民及無產階級革命等等發展過程，造就了西方資本主義統治世界 (Anievas & Nişancıoğlu, 2015)。「全球歷史社會學」學者認為即使「批判國際關係理論」批判了歐洲歷史、帝國主義及（新）殖民主義，但仍是以西方的行為主體性造就出「批判歐洲崇拜主義」(critical Eurofetishism)，邊緣化或漠視非西方的行為主體性，重新製造了不同的歐洲中心主義。因為大多數的「批判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想要揭露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遂強調當前的權力不對稱性及西方結構的主導性，反而建構出西方行為主體性與非西方主體性兩相互補、糾結在一起的二元對立概念。西方是具有超級行為主體能力 (hyper-agential power) 的贏者，主導全球政治；非西方是沒有行為主體能力的沉默受害者，對全球政治沒有影響 (Hobson & Sajed, 2017)。

然而，「西方」此概念是興起於不同的文明概念認知及不同的文明歷史模式之內，「西方」被視為是廣大文明化過程的中心，提供了理性國家邁向人道演化中的模式；「西方」也是文明認同，各文明認同之間的互動構成文化的世界秩序，各種不同的「西方」概念是共存的，隨著其歷史環境、知識影響及文

化的世界秩序而有不同概念 (O'Hagan, 2002)，即當前的「西方」是與其他非西方文明互動構成。

二、長期（世界或全球）歷史的多重現代性與文明化過程

「全球歷史社會學」是以長期歷史的多重現代性⁵與文明化過程探索國際關係，人類社會的「現代性」是多元的、共存且相互緊密互動關聯，而非只有西方才是「現代性」的先驅者，全球歷史的行為主體性是多元的，歐洲與非歐洲強權在西方殖民前及期間都是有其滲透性，在其區域內發展成「現代性」的中心。「現代性」是多元及多重的，而且相互之間的歷史是有相關聯的，即是「將國際關係研究予以文明化」(civi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且此文明不是單指「西方」文明，而是諸多文明所「將國際關係研究予以文明化」過程。例如藉由探索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東方世界起源，以及發現原始的西方世界，以反制當前以西方歐洲為中心的迷思，實為「東方的西方」而非單純的西方崛起，東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Hobson, 2004)。進而以東方的全球化過程，建立東西方文明之間關係的全球對話，以此文明之間全球對話的世界史，重新建構國際關係 (Hobson, 2007b)。

John Hobson認為1760 ~ 2010年的國際（關係）理論是西方文明的辯護者，不同時期的國際關係理論都是在建構歐洲中心主義，本身就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建構體，建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政治概念，具有明顯的或潛意識的歐洲中心主義 (Hobson, 2012: 1-30)；藉由不同類型的歐洲中心主義（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種族帝國主義、種族反帝國主義、正統的潛意識歐洲中心主義及批判的潛意識歐洲中心主義），以避免將國際關係的歐洲中心主義與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混淆了，國際關係學者要能反思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其歐洲中心的理論假定，甚至是種族論者的現實主義 (Hobson, 2012: 313-344)。需要重新建構另類的非歐洲中心的學科基礎，提供另類的研究議程及經驗分析，國際關係研究才能解脫既有的歐洲中心緊身衣及「薛西弗斯監獄」(Sisyphean prison)，⁶因為當前的國際關

⁵ 多重現代性是社會學者 Shmuel N. Eisenstadt (2000: 24) 首先提出的觀點，他認為現代化模式或現代性的文明化過程不是只有西方的模式，當前全球化趨勢顯示出持續重新詮釋現代性、多重現代性的建構，以及不同團體或運動自行重新解釋及定義現代性。

⁶ 此處薛西弗斯監獄是以古希臘神話薛西弗斯推巨石到山頂，只要一休息巨石就滑落，隱喻當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永無止境的徒勞無功之作。

係學者只是不斷地以新包裝重新呈現，或重新回收破舊的歐洲中心口號及比喻 (Millerman, 2015)。但藉由引述歐洲、亞洲及非洲學者觀點，就能突破此歐洲中心主義 (Hobson, 2014)。「全球歷史社會學」嘗試以非歐洲學者的研究成果突破歐洲中心主義，展現「全球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向，在於以全球社會整體轉型「文明化國際關係」。

三、國際關係的全球性與全球社會

「全球歷史社會學」在探討「全球性」或「全球社會轉型」時，尋求探索國際關係的全球性，尤其是國家關係與形成的全球轉型，以及全球民主革命、威權政權反革命與其引發的種族屠殺戰爭 (Shaw, 2000, 2001)。「全球性」是一個非常特定的歷史轉型，1989年起，帶有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新權力平衡的全球民主革命所引發的社會政治動盪，正在創造世界秩序的新時期 (Shaw, 2001: 286)。Mathias Albert與Barry Buzan更以「社會總體」(social whole) 說明此社會總體系統，國際關係是此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際關係理論也就成為社會理論，並可藉由系統、層次及部分 (sectors) 分析此社會總體 (Albert & Buzan, 2013)；並以「全球社會總體」(global social whole) 稱呼「全球系統」及「全球社會」所涉及全球規模的互動及溝通 (Albert & Buzan, 2013: 119-120)。Buzan也和Lawson以「全球轉型」的世界歷史觀點探索全球社會的歷史轉變過程，藉以開展國際關係的全球化過程 (Buzan & Lawson, 2015)。他們的目的在綜合同源的研究領域促使跨學科對話更容易，以及推動全球的國際關係研究 (Buzan & Lawson, 2016: 17)。

簡言之，「全球歷史社會學」以全球社會整體思考全球社會的轉型，「全球國際關係」是全球社會的一部分，也是其研究文明化國際關係、全球化或全球社會轉型的一部分，其觀點正足以作為發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參考。而非僅是東南西北地理區域、東西方文明、不同宗教文明或全球化議題的擴充，更重要的是更深層的反思。誠如陳慶昌 (Ching-Chang Chen) 所言，只是呼籲更多納入非西方的觀點或非西方學者的當地「前瞻觀點」(vintage points)，並不能使國際關係更為全球或民主 (Chen, 2011)，而是需要反思國際關係理論本身是在呈現或再呈現人類社會轉型的事實或現象。

綜合上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是呈現或再呈現當代全球社會的轉型，藉由「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分析及超越國際關係理論的西方歐洲中心主義，尤其國際關係學者有些反歐洲主義的論點仍是基於歐洲中心主義，也就是歐洲中心的反歐洲主義 (Eurocentric Anti-Eurocentrism)，並未釐清資本主義與現

代性的全球歷史發展，「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多重現代性及歷史性觀點有助於修正此缺失 (Duzgun, 2020)，將會攸關「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後續發展。甚至有學者提出以「全球歷史社會學」觀點促進「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例如以「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多重現代性發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Phillips, 2016b)，並主張「連結的各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 的全球歷史觀點有助於提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資源，遂以歐洲歷史發展的「混合型的帝國層級體系」及「社會分層化過程」作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主要的歷史焦點，研究西方歐洲崛起帶來印度洋地區主權、現代性及現代國際體系的擴張 (Phillips, 2016a)。因此，「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對話將會是支撐「國際關係研究」全球化與全球化的論述基礎，以全球社會整體轉型論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

伍、「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的連結對話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僅是研究層次的擴展，也意味著反歐洲中心的國際關係觀點，它可以藉由非（後）西方觀點檢視與擴展主流理論的普遍性，也可以藉由「全球歷史社會學」強化其全球國際社會觀點。誠如前述，Acharya和Buzan在反思推動亞洲學派十年的進展時，指出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啟發，以「不平等混合發展」的觀點、理論與歷史之間共同組成關係、「全球國際社會」觀點，探索而提倡「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 Buzan, 2017: 348-355)，這觀點正是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簡言之，他們就是受到「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啟發與影響而倡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這就不得不歸功於Buzan，他不僅影響「哥本哈根學派」及「英格蘭學派」(Griffiths, Roach, & Solomon, 2009: 220-226)，更影響「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的發展，也影響著學者連結兩領域的對話。「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是只限於單一的全球對話，而是關注對話排除了何者，較鼓勵研究途徑綜合，而不是只選擇一個研究途徑 (Acharya & Buzan, 2019: 299)。

一、Buzan的連結對話角色⁷

誠如上述，Acharya和Buzan在2007年發表「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

⁷ 根據 Buzan 於 2021 年 1 月 2 日回覆作者 email 詢問時，他回覆：他是因緣際會與 Lawson 和 Acharya 同事而與「全球歷史社會學」及「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產生連結，他並無意

論」倡議亞洲學派理論，「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觀點雖說是Acharya在2014年年會的會長演說中提出，並在2019年與Buzan共同出版《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形成》（*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一書成為巔峰，豐富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發展，其中Buzan有關「全球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尤為重要。因為該書是以全球國際社會形成 (formation) 的觀點探討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歷程，藉由「現代性」物質與理念的影響，國際社會擴展成西方殖民的全球國際社會，進而邁向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 & Buzan, 2019: 33-66, 285-320)。

Buzan是跨越「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兩個領域的重要學者，他既和Acharya推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又和其他學者擴展「全球歷史社會學」研究。例如Buzan 和Richard Little嘗試以世界史的觀點發展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將非西方的歷史納入國際關係理論之中 (Buzan & Little, 2010: 197-220)。Buzan和全球歷史社會學者Lawson更以19世紀的「全球轉型」而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說明當代國際關係、世界體系或全球現代性的形成。「全球現代性」在19世紀的工業化過程、理性國家及進步意識形態，造就了歐洲強國的興起與以歐洲強國為核心的現代國際關係；以及對暴力組織（主要是國家）產生了轉型影響，包括中心（西方歐洲）國家與邊陲國家（非西方歐洲）之間的權力差距，以及工業化的軍備競賽造成強國之間不穩定的關係 (Buzan & Lawson, 2015)。Buzan也和全球歷史社會學者Albert及Michael Zürn以「社會分殊化」理論說明國際關係是全球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際關係理論是為一種社會理論，藉由（世界政治）系統、（區域、國際）層次及（政治、經濟）部分分析全球社會總體與世界政治 (Albert & Buzan, 2013; Albert, Buzan, & Zürn, 2013)。後來證明Buzan的「全球歷史社會學」觀點能提供Acharya在推動亞洲學派或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失敗後，倡議「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全球國際社會論點 (Acharya & Buzan, 2019)。Buzan和相關學者合作的「全球歷史社會學」研究成果，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後設理論基礎，超越西方與非（後）西方的爭論。

Acharya & Buzan (2017: 348-355, 2019) 就指出其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啟發，以「不平等混合發展」及「全球國際社會」的觀點，提倡「全球國際關係研

如此，但時間機緣發展而產生連結，成為兩者溝通橋樑的一部分；他只是做出些許貢獻，也樂觀其成兩者能加強連結。

究」。其實，後殖民主義的「不平等混合發展」及「全球國際社會」觀點也正是第三波「全球（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觀點（郭雪真，2013，2019），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是理論或方法，而是研究分析國際關係多樣性的架構，尤其是分析國際關係學科所邊緣化的非西方人民、社會與國家；強調國際關係理論及方法的多樣性、多元主義及綜合，以及多重的對話（Acharya & Buzan, 2019: 298-299, 305），即是渴望國際關係學科更大的包容性與多樣性（Acharya, 2014a: 649）。

由此可知，Buzan在發展「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及「全球歷史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當以「全球歷史社會學」觀點反思「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及未來可能發展之時，也就是「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對話，「全球歷史社會學」觀點提供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更充實的超越國際關係西方歐洲中心主義之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論述，即是以全球性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論述。

二、本體論的對話——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就是以結構功能分殊化理論為基礎，提出超越目前歐洲中心主義及平衡西方與非西方文化差異的分析架構，比較分析探討雙方的國家、國家體系與國際秩序，尋求與建立普遍特質而累積知識（Butcher & Griffiths, 2017）。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未關注本體論問題，仍在以單一的世界真實（a singular world reality）繼續實踐殖民（國際關係）科學，即是已承認世界觀點的多重性，但不承認許多真實世界的存在，而倒退成只有「一個世界的世界」（a one-world world）（Blaney & Tickner, 2017）。「全球國際關係研究」還是認為世界只有一個全球世界，各地區的世界（regional worlds）共同組成唯一的全球世界，而非承認每個地區世界就是一個全球世界。但這是誤解了「全球國際關係研究」，Acharya和Buzan就指出以各世界歷史及探索各區域世界為基礎（Acharya & Buzan, 2019: 309）；文明之間並不必然是衝突，是能和平互動及相互學習，西方與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也是相互學習與互補（Acharya, 2014a; Acharya & Buzan, 2019: 285-320）。

「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有助於釐清此西方與非西方的本體二分論，要消除殖民化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就要消除西方與非西方分類背後隱藏的種族歧視意識形態，國際關係學者要超越此意識形態，重新建構「後種族主義者」的「批判性國際關係研究」（Hobson, 2007a）；西方與非西方不是自主的也不是分開的，而是相互鑲嵌及共組而成的，兩者持續不斷的互動及有關係的相

互關聯，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西方或非西方而是兩者混合存在，基於啟發思考的目的而將兩者分開 (Hobson & Sajed, 2017: 571)。例如以「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多重現代性」及「各文明的對話」觀點探索超越當前以西方為中心的多極國際體系世界秩序，藉由文明對話與區域主義構成多元文化的區域整合過程，產生多元文明—多重的世界秩序或全球多元文化主義 (Petito, 2016)。

綜合上述，地理位置或地緣政治的本體二分論區隔並非真實存在，只是人們區別所處的地理位置所致。即使如此，在追求本土成長的國際關係理論時，仍不免會產生質疑是基於「民族主義」，本土成長理論化只是民族主義的工具，是要未來行銷自己的國家與社會，擴展自己國家在當地的影響力 (Kuru, 2018: 79-80)。甚至提出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也是帶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只是要重建中心與邊陲國家的關係 (Aydinli & Biltekin, 2018b: 47)，其實中國學者秦亞青提出的關係主義發展「中國學派」就是有這樣的意味，想要重新建構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全球歷史社會學」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本身，也是非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作用，即是要批判或質疑主流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某種形式的西方民族主義），只是提出倡議的學者是英美學者，也就忽略了這民族主義的背景。因此，「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在本體論的對話建立於兩者皆批判及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皆主張藉由相互對話與學習，綜合雙方的觀點產生全球多元的文化及國際社會知識。尤其兩者在本土成長理論化時，必須避免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民族主義意涵，以獲取全球國際關係學界接受、相互接觸與成長的理論化。

三、知識論的對話——西方與非西方的相互補充及學習

誠如上述的第貳節所述，亞洲國際關係學者以本土成長的觀點提出源自其社會及歷史的思想，作為其國際關係理論化的知識論基礎，發展非（後）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是無法掌握國際關係的多元性與異質性，而是需要關注其脈絡及過程，聚焦於兩方知識的互動、互補與共同演進，探索其共同 (common) 知識（即世界運作的普遍理論）及內隱 (tacit) 知識（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前者聚焦於相互主觀的知識累積發展普遍理論，後者聚焦於自然出現屬性的實踐連結各種世界觀，結合兩類知識就能掌握國際關係的全球理論 (Katzenstein, 2018)。改進國際關係的歐洲中心主義是要以多重始點探討全球轉型，補充其他文明或帝國對當時國際社會的觀點 (Bilgin, 2016b)，增加說明文明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Owens, 2016)，即是論述相同時間但不同空間的文明觀點，論述不同文明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對於國際社會或全球社會的知識

理解，需要關照共同存在的不同文明觀點，才能發展出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以多元知識論的觀點，藉由不同類型的對話（蘇格拉底式 [Socratic]、哈伯瑪斯式 [Habermasian] 及韋伯式）、方法、目標與策略，以促使西方與非西方觀點的互補互惠及相互學習 (Eun, 2019)。

如同上述的本體論對話一樣，「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皆在批判與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法，兩者在知識論的對話，首要在於以多元知識論的觀點發展本土成長的理論或本土理論化，進而統合研究為全球社會的知識。不容諱言，只是前者較重視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化與全球化，後者則較重視本土歷史社會成長的國際關係研究。但在多元知識論的觀點，兩者仍可整合不同的知識論觀點探索相同的議題，例如以對話方式比較華語圈 (Sinophone) 與英語圈 (Anglophone) 學者研究關係主義 (relationalism) 的不同知識論主張，以發展全球關係的理論化 (global relational theorizing) (Nordin et al., 2019)。

四、方法論的對話——世界歷史研究、全球社會結構研究法及文明分析法

方法論是國際關係學界通用語 (lingua franca)，方法論的研究途徑與工具構成此通用語，其品質決定了非西方邊陲國際關係學界能否與西方中心雙向對話 (Aydinli, 2020)，尤其從事「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學者皆是主張國際關係研究的多樣性及多元主義，倡議吸納非（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及實務，藉以超越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研究而進行全球層次的國際關係研究 (Eun, 2018; Peter & Wemheuer-Vogelaar, 2016)。因此，「全球歷史社會學」強調全球各國際社會的歷史脈絡化，在研究方法論的對話上，其所主張的世界歷史研究法、全球社會結構研究法及文明分析法正是基礎。藉由世界歷史與文明分析法重新建構國際關係，即是對照國際體系的歷史社會結構變遷，探討全球國際社會在不同時空的變遷或相同時間不同空間的變遷，尤其是其社會結構不同層面的變遷，理解不同文明之間的歷史社會變遷過程及相互影響的過程 (Hobson, 2004, 2007b; Hobson & Hobden, 2002)。進而結合「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知識史」，相互對話而能更理解「全球性」(Kuru, 2020)。

「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主張從世界歷史發現各種新模式、新理論及新方法 (Acharya, 2014a)，以各世界歷史及探索各區域世界為基礎 (Acharya & Buzan,

2019: 309)，以及藉由探討各區域世界的運作為研究途徑 (Deciancio, 2016)，更要納入西方與非西方的觀點及文明化過程 (Bischoff et al., 2016)。知識的產生不在於地理位置而在不同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因為地理位置是類別本質 (categorical essences) 而非事實本質 (in fact essences) (Go, 2014: 125)。即是對於西方理論及觀點採取溫和、包容的途徑而非激進、批判的途徑，要以地緣文化社群看待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即是在不同地理及文化脈絡所發展的國際關係理論，以文明化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實踐社群就越能再呈現地緣文化社群，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是也應該是包容的 (Qin, 2020)。

「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探討「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是更能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也更能理解國際關係研究擴展到全球層次的意義，以及「全球歷史社會學」所探討的全球國際（世界）社會正是「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所探討的全球國際社會，即是強調以世界歷史研究法探討此全球社會的歷史脈絡化及文明化過程。例如結合「全球歷史社會學」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觀點探討當前的伊朗民粹主義，前者提供民粹主義內外因素或國內外因素之間的相互連結性，後者提供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空間擴展的知識論架構，藉以展現伊朗菁英的民粹主義論述所建構的以色列及全球秩序，以及伊朗本身的認同體 (Holliday, 2020)。或是藉由前者的19世紀全球轉型觀點探索日本學者的政治思想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以凸顯後者更大的多元性，並以當地生產的國際關係研究進行沒有邊界的全球對話，而重新配置後者 (Rösch & Watanabe, 2018)。這樣的連結對話使「全球國際關係研究」不再只是研究範圍的擴大，而是以全球歷史社會的發展探索當地所受到的影響，深化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度。

陸、結論

國際關係研究歷經美國或歐洲主導的西方歐美中心主義，引起批判及提出非西方或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以本土成長理論化發展各種理論與研究，豐富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誠如Acharya and Buzan (2019: 292) 所言，「在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道路上，美國學科霸權是可以移除的障礙。」但也陷入西方、非西方與後西方的分類範疇爭論，以及背後蘊含的意識形態爭論。甚至會有過分強調各國學派本土理論的「再國家化」或「巴爾幹半島化」 (Balkanization) 的危險，反而造成國際關係研究的退步 (Buzan, 2016: 157)。Acharya和Buzan遂從推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而進展到推動「全球國際關係研

究」，即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化與全球化，嘗試超越此分類範疇與意識型態的爭論，鼓勵全球國際關係學者呈現各方本土成長的理論與研究，並以對話與合作發展全球國際社會各地相關聯的世界政治歷史及經驗。「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出現不僅顯示出學者批判西方與非西方的爭論，也顯示出國際關係研究從國際層次擴展至全球層次。Buzan也和 Lawson、Albert及Zurm發展「全球歷史社會學」，以全球社會的分殊化與轉型說明全球社會的歷史發展。無論在批判國際關係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上，以及在提出多重現代性與世界、各相關聯的世界史、文明對話上，「全球歷史社會學」理論正可以提供理解此擴展過程的觀點。

然而，「全球國際關係研究」是否仍會如Acharya和Buzan倡議建立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亞洲學派一樣，只是吸引少數非西方國際關係學者的關注，並未改變當前國際關係研究以歐美為中心的現況。若是以全球對話的觀點，而非西方與非西方對話，並藉由「全球歷史社會學」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連結對話，思考「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未來發展，就會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化」與「全球化」，強化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產生與運用。「全球歷史社會學」與「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連結對話，提醒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學者關注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內涵；並呼籲非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要發展本土成長的理論，藉以突破國際關係學界英美霸權的現況，雙方共同擴展學科研究的範圍與內容，提升國際關係知識的貢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江麗，2013，〈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轉向〉，《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4期，頁77-92。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3.04.008
- 王軍，2007，〈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基本概念、理論演進與價值〉，《社會理論》，第1期，頁21-46。
- 方萬全，2001，〈翻譯、詮釋與不可共量性〉，載於朱元鴻、傅大為（編），《孔恩：評論集》，頁19-48，臺北：巨流。
- 石之瑜，2010，〈國際關係研究的亞洲地方性學派〉，《國際政治科學》，第3期，頁51-73。
- 汪宏倫，2011，〈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頁259-286，臺北：五南。
- 余家哲、李政鴻，2009，〈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40期，127-152。doi:10.6166/TJPS.40(127-152)
- 余麗，2010，〈先秦中原文化區域國際政治思想主幹及其當代價值〉，《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頁101-118。
- 余瀟楓、章雅荻，2019，〈和合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範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7期，頁49-76。
- 周方銀，2012，〈鬆散等級體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時期「尊王」爭霸策略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6期，頁4-34。
- 秦亞青，2005，〈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頁165-176。
- 秦亞青，2015，〈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探索——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頁4-10。
- 秦亞青，2016，〈國際政治關係理論的幾個假定〉，《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0期，頁19-28。
- 秦亞青，2020，〈全球國際關係學與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國際觀察》，第2期，頁27-45。
- 徐進，2012，〈春秋時期「尊王攘夷」戰略的效用分析〉，《國際政治科學》，第2期，頁38-61。

郭雪真，2013，〈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3期，頁63-96。doi:10.30390/ISC.201309_52(3).0003

郭雪真，2019，〈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理論：發展與批判〉，《政治學報》，第68期，頁75-108。doi:10.6229/CPSR.201912_(68).0003

二、英文部分

Acharya, A., 2011.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pp. 619-637. doi:10.1177/0305829811406574

Acharya, A., 2014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pp. 647-659. doi:10.1111/isqu.12171

Acharya, A., 2014b. *Rethinking Power, Institutions and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Whose IR?* New York: Routledge.

Acharya, A., 2015. "An IR for the Global South or a Global IR?" *Global South Review*, Vol. 2, No. 2, pp. 175-177. doi:10.22146/globalsouth.28874

Acharya, A., 2016. "Advancing Global IR: Challenges, Contentions, and Contrib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4-15. doi:10.1093/isr/viv016

Acharya, A., 2017.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pp. 816-828. doi:10.1080/09512748.2017.1318163

Acharya, A., & Buzan, B., 2007a. "Conclus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pp. 427-438. doi:10.1093/irap/lcm017

Acharya, A., & Buzan, B., 2007b.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pp. 287-312. doi:10.1093/irap/lcm012

Acharya, A., & Buzan, B., eds., 2010.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Acharya, A., & Buzan, B., 2017.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7, No. 3, pp. 341-370. doi: 10.1093/irap/lcx006

Acharya, A., & Buzan, B., 2019.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

- 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108647670
- Albert, M., & Buzan, B., 20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ocial Whole': Encounters and Gaps between IR an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7, No. 1, pp. 117-135. doi:10.1111/ips.12013
- Albert, M., Buzan, B., & Zürn, M., 2013. "Int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 Albert, B. Buzan, & M. Zürn,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pp. 1-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856041.002
- Alejandro, A., 2017. "Eurocentrism, Ethnocentrism, and Misery of Pos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A Problematic Oversight."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1, pp. 5-20. doi:10.3224/eris.v4i1.01
- Anderl, F. & Witt, A. 2020. "Problematising the Global in Global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No. 1, pp. 32-57. doi:10.1177/0305829820971708
- Anievas, A., & Nişancioğlu, K., 2015. *How the West Came to Rule: The Geopolitical Origins of Capitalism*. London, UK: Pluto Press.
- Aydinli, E., 2020. "Methodology as a Lingua Franc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ipheral Self-Reflections on Dialogue with the Cor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2, pp. 287-312. doi:10.1093/cjip/poaa003
- Aydinli, E., & Biltekin, G., eds., 2018a. *Widening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megrown Theorizing*.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702239
- Aydinli, E., & Biltekin, G. 2018b. "Widening the World of IR: A Typology of Homegrown Theorizing."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1, pp. 45-68. doi:10.20991/allazimuth.328427
- Aydinli, E., & Mathews, J., 2008. "Periphery Theorising for a Truly Internationalised Discipline: Spinning IR Theory Out of Anatol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4, pp. 693-712. doi:10.1017/S0260210508008231
- Beier, J. M., 200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Indigeneity, Cosmology,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403979506
- Bentil, S., 2020. "When You Think of a Global IR Theory, Think Uhuru Na Ujamaa?" *Asian Research Journal of Arts & Social Science*, Vol. 10, No. 1, pp. 8-20.

doi:10.9734/ARJASS/2020/v10i130137

- Bilgin, P., 2008. "Thinking Past 'Western' I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1, pp. 5-23. doi:10.1080/01436590701726392
- Bilgin, P., 2010.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eyond the Wes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1, No. 5, pp. 817-828. doi:10.1080/01436597.2010.502696
- Bilgin, P., 2016a. "'Contrapuntal Reading' as a Method, an Ethos, and a Metaphor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134-146. doi:10.1093/isr/viv018
- Bilgin, P., 2016b. "How to Remedy Eurocentrism in IR? A Complement and a Challenge for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8, No. 3, pp. 492-501. doi:10.1017/S1752971916000178
- Bilgin, P., 2020.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Non-Western IR." In S. C. Roach, ed.,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28).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doi:10.4337/9781788112895.00009
- Bischoff, P.-H., Aning, K., & Acharya, A., eds., 2016. *Africa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erging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693781
- Blaney, D. L., & Tickner, A. B., 2017. "Worlding, Ont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ecolonial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3, pp. 293-311. doi:10.1177/0305829817702446
- Butcher, C. R., & Griffiths, R. D., 2017. "Between Eurocentrism and Babel: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tates, State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2, pp. 328-336. doi:10.1093/isq/sqw057
- Buzan, B., 2016., "Could IR B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155-157. doi:10.1093/isr/viv025
- Buzan, B., & Lawson, G.,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565073
- Buzan, B., & Lawson, G., 2016. "Author's Response by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Diplo*, Vol. 8, No. 10, pp. 14-18.
- Buzan, B., & Little, R., 2010.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Wester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 Acharya & B.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97-221). London, UK: Routledge.
- Cardoso, F. H., &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M. M. Urquidi, T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C.-C., 2011. “The Absence of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Asia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No. 1, pp. 1-23. doi:10.1093/irap/lcq014
- Choi, J. K., 2008. “Theorizing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1, pp. 193-216.
- Clifford, S., 2011. “Theory Talk #42: Amitav Acharya on the Relevance of Regions, ASEAN, and Western IR’s False Universalisms.” in *Theory Talks*: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1/08/theory-talk-42.html>, Available: 2019/11/20.
- Cotton, J., 2013. *The Austral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308061
- Deciancio, M., 201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106-119. doi:10.1093/isr/viv020
- Duzgun, E., 2020. “Against Eurocentric Anti-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Marx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3, No. 2, pp. 285-307. doi:10.1057/s41268-018-0146-0
- Eisenstadt, S. N.,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pp. 1-29.
- Ersoy, E., 2018. “Conceptual Cultivation and Homegrown Theorizing: The Case of/for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2, pp. 47-64. doi:10.20991/allazimuth.334964
- Eun, Y.-S., 2018. *What Is at Stake in Building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270678
- Eun, Y.-S., 2019. “Global IR through Dialogu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pp. 131-149. doi:10.1080/09512748.2018.1461680
- Femia, J., 2005. “Gramsci, Machiavelli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6, No. 3, pp. 341-349. doi:10.1111/j.1467-923X.2005.00692.x
- Gardner, P., 2015. “Transnational Theory, Global World: Theory Matters, Not Geography.” *Global Politics Review*, Vol. 1, No. 1, pp. 8-17. doi:10.5281/zenodo.1238574

- Gelardi, M., 2019. "Moving Global IR Forward—A Road Map."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4, pp. 830-852. doi:10.1093/isr/viz049
- Griffiths, M., Roach, S. C., & Solomon, M. S., 2009.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Go, J., 2014. "Occluding the Global: Analytic Bifurcation, Causal Scientism, and Alternativ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Studies*, Vol. 5, No. 1, pp. 122-146.
- Go, J., & Lawson, G., eds., 2017.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316711248
- Hobson, J. M., 2004.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489013
- Hobson, J. M., 2007a. "Is Critical Theory Always for the White West and for Western Imperialism? Beyond Westphalian Towards a Post-Racist Critical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3, No. S1, pp. 91-116. doi:10.1017/S0260210507007413
- Hobson, J. M., 2007b.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pp. 414-430. doi:10.1057/palgrave.ip.8800198
- Hobson, J. M., 2012.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096829
- Hobson, J. M., 2014. "Re-viewing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A Response to Knutsen, Ling, Schmidt, Tickner and Vitali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2, No. 2, pp. 485-514. doi:10.1177/0305829813515042
- Hobson, J. M., & Hobden, S., 2002. "On the Road Toward an Historicised World Sociology." In S. Hobden & J.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65-28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J. M., & Sajed, A., 2017. "Navigating Beyond the Eurofetishist Frontier of Critical IR Theory: Exploring the Complex Landscapes of Non-Western Agen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4, pp. 547-572. doi:10.1093/isr/vix013
- Holliday, S. J., 2020. "Populism, the International an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Global Order and the Iran-Israel Nexu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8, No. 1, pp.

- 3-19. doi:10.1177/0032321718817476
- Huang, C.-C., 2015.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The Essence of Myanmar's China Polic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2, pp. 189-210. doi:10.1080/09512748.2014.995122
- Hurrell, A., 2016. "Towards the Glob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9, No. 2, pp. 1-18. doi:10.1590/0034-7329201600208
- Hutchings, K., 2011. "Dialogue between Whom? The Role of the West/ Non-West Distinction in Promoting Global Dialogue in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pp. 639-647. doi:10.1177/0305829811401941
- Ikeda, J., 2010. "The Post-Western Tur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9, pp. 29-44.
- Inayatullah, N., & Blaney, D. L., 1996. "Knowing Encounters: Beyond Paroch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 Lapid &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pp. 65-84).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Jackson, P. T., & Nexon, D. H., 1999.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pp. 291-332. doi:10.1177/1354066199005003002
- Jones, B. G., ed., 2006.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Jorgensen, K. E., 2018. "Would 100 Global Workshops on Theory Building Make A Difference?"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2, pp. 65-80. doi:10.20991/allazimuth.335814
- Kaczmarek, K., 2020. *Making Global Knowledge in Local Context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cy Advice in Russia*.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429197345
- Katzenstein, P. J., ed., 2012.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127063
- Katzenstein, P. J., 2018. "The Second Coming? Reflections on a Glob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4, pp. 373-390. doi:10.1093/cjip/poy012
- Kavalski, E., 2017.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109657

- Kavalski, E., 2018. "Chinese Concepts and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1, pp. 87-102. doi:10.20991/allazimuth.325784
- Kayaoglu, T., 2010. "Westphalian Eur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2, pp. 193-217. doi:10.1111/j.1468-2486.2010.00928.x
- Kim, H. J., 2016. "Will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a Powerful Alterna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9, No. 1, pp. 59-79. doi:10.1093/cjip/pov014
- Knutsen, T. L., 2016.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uru, D., 2018. "Homegrown Theorizing: Knowledge, Scholars, Theory."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1, pp. 69-86. doi:10.20991/allazimuth.321993
- Kuru, D., 2020. "Dialogue of the 'Globals': Connecting Global IR to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9, No. 2, pp. 229-248. doi:10.20991/allazimuth.730127
- Larus, J., ed., 1964. *Comparative World Politics: Readings in Western and Premoder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 Ling, L. H. M., 2018. "Heart and Soul for World Politics: Advaita Monism and Daoist Triangles in 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pp. 313-337. doi:10.1093/irap/lcy004
- Mallavarapu, S., 2009.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6, No. 1-2, pp. 165-183. doi:10.1177/002088171004600211
- Millerman, M., 2015. "Theory Talk #71: John M. Hobson on Eurocentrism,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he Curious Case of Postcolonialism." in *Theory Talks*: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5/09/theory-talk-71.html>, Available: 2019/11/25.
- Min, B. W., 2016. "Not So Universal? The Search for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Sou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3, pp. 461-487. doi:10.14731/kjis.2016.12.14.3.461
- Mishra, A., 2014. "Indigenism in Contemporary IR Discourses in India: A Critique." *Studies in Indian Politics*, Vol. 2, No. 2, pp. 119-135. doi:10.1177/2321023014551869
- Moshirzadeh, H., 2018. "Iranian Scholars and 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1, pp. 103-120. doi:10.20991/allazimuth.325790
- Murray, C., 2020. “Imperial Dialectics and Epistemic Mapping: From Decolonisation to Anti-Eurocentric I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2, pp. 419-442. doi:10.1177/1354066119873030
- Nordin, A. H. M., et al., 2019. “Towards Global Relational Theor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Sinophone and Anglophone Scholarship on Relation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5, pp. 570-581. doi:10.1080/09557571.2019.1643978.
- Nuruzzaman, M., 2018. “Western and Islamic International Theo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5, No. 2, pp. 106-129. doi:10.1177/0020881718790687
- O’Hagan, J., 2002. *Conceptualizing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pengler to Said*.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403907523
- Owens, P., 2016.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What?”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8, No. 3, pp. 448-457. doi:10.1017/S1752971916000130
- Peng, L., 2019. “Chinese IR Sino-Centrism Tra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pp. 150-167. doi:10.1080/09512748.2018.1461681
- Peters, I., & Wemheuer-Vogelaar, W., eds., 2016.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midst Divides and Diversity*.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57410-7
- Petito, F., 2016.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oward a Multicivilizational-Multiplex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78-91. doi:10.1093/isr/viv030
- Phillips, A., 2016a. “Global IR Meets Global History: Sovereignty, Moder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Expansion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62-77. doi:10.1093/isr/viv029
- Phillips, A., 2016b.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Multiple Early Moder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ang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8, No. 3, pp. 481-491. doi:10.1017/S1752971916000166
- Qin, Y., 2007.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pp. 313-340. doi:10.1093/irap/

lcm013

- Qin, Y., 2009.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 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15, No. 3, pp. 5-20. doi:10.1080/02529200903342560
- Qin, Y., 2016a.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33-47. doi:10.1093/isr/viv031
- Qin, Y., 2016b.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Progress through Deb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No. 3, pp. 231-257. doi:10.1093/irap/lcr003
- Qin, Y., 2018.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316869505
- Qin, Y., 2020.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Turn in IR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Y. Qin,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pp. 1-26).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429356292-1
- Rood, T., 2010. "Herodotus' Proem: Space, Tim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iadne*, Vol. 16, No. 16, pp.43-74.
- Rösch, F., & Watanabe, A., 2017. "Approaching the Unsynthesizab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iving Substance to Security Discourses through Basso Ostinato?"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pp. 609-629. doi:10.1177/1354066116656764
- Rösch, F., & Watanabe, A. 2018. "Introduction Japan as Potential: Communicating across Boundaries for 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 Rösch & A. Watanabe, eds.,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19).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Shahi, D., 2018. *Advaita as 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51018036
- Shahi, D., 2019a. "Introducing Sufism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Epistem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1, pp. 250-275. doi:10.1177/1354066117751592
- Shahi, D., 2019b. *Kautilya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Pivot. doi:10.1007/9783030017286
- Shahi, D., & Ascione, G., 2016. "Rethinking the Absence of 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 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Advaitic Monism' as an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cal Resour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2, pp. 313-334. doi:10.1177/1354066115592938
- Shani, G., 2008. "Toward a Post-Western IR: The Umma, Khalsa Panth, 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pp. 722-734. doi:10.1111/j.1468-2486.2008.00828.x
- Shaw, M., 2000.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 R.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pp. 229-241). London, UK: Routledge.
- Shaw, M., 2001.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Our Times: The Question of Globalit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No. 2, pp. 273-289. doi:10.1080/09557570108400374
- Shih, C.-y., 2017. "Transcending Hegemon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zation: Nothingness, Re-Worlding, and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6, No. 2, pp. 19-42. doi:10.20991/allazimuth.310126
- Shih, C.-y., 2018.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Homegrown Theorizing."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2, pp.108-109. doi:10.20991/allazimuth.386638
- Shih, C.-y., et al., 201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London, UK: Routledge.
- Shih, C.-y., & Huang, C. C., 2014.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Farnham, UK: Ashgate.
- Shih, C.-y., & Hwang, Y.-J., 2018. "Re-Worlding the 'West' in Post-Western IR: the Reception of Sun Zi's *The Art of War* in the Anglosphe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pp. 421-448. doi:10.1093/irap/lcy009
- Shih, C.-y., & Yu, P.-t. 2015. *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The Pre-Modern Politics of Gongsun Long*.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493217
- Shilliam, R., 2011. "Non-Western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 Shilliam,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pp. 1-11).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842126

- Shimizu, K., et al., 2008. *Is There A Japanese IR? Seeking an Academic Bridge through Japan'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iga, Japan: Afrasian Research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yukoku University.
- Smith, K., 2018.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from Africa."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2, pp. 81-92. doi:10.20991/allazimuth.335811
- Spohn, W., 2011. "An Appraisal of Shmuel Noah Eisenstadt's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11, No. 3, pp. 281-301. doi:10.1177/1468795X11406025
- Sune, E., 2016.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bn Khaldun."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5, No. 1, pp. 79-88. doi:10.20991/allazimuth.167344
- Supachalasai, C., 2017. "Decoloni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hai IR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47, No. 1, pp. 37-62.
- Tickner, A. B., 2003. "Seeing IR Differently: Notes from the Third Worl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2, pp. 295-324. doi:10.1177/03058298030320020301
- Tickner, A. B., & Blaney, D. L., eds., 2012.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129920
- Tickner, A. B., & Blaney, D. L., eds., 2013. *Claiming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758366
- Tickner, A. B., & Waever, O., eds., 200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885451
- Vasilaki, R., 2012. "Provincialising IR? Deadlocks and Prospects in Post-Western IR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pp. 3-22. doi:10.1177/0305829812451720
- Voskressenski, A. D., 2017. *Non-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ualizing World Regional Studie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07/978-3-319-33738-8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aver, O., 1998.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687-727. doi:10.1162/002081898550725
- Wemheuer-Vogelaar, W., & Peters, I., 2016. “Introduction: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ing Geo-Epistemological Divides and Diversity.” In I. Peters & W. Wemheuer-Vogelaar, eds.,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midst Divides and Diversity* (pp.1-2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57410-7_1
- Yalvaç, F., 2016. “Ibn Khaldûn’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 Abdelkader, N. Adiong, & R. Mauriello, eds.,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ribution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p. 77-103).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07/978-1-137-49932-5_4
- Yan, X., 2019.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10.1515/9780691191935
- Zhang, Y., & Chang, T., eds., 2016.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Zhang, Y., & Kristensen, P. M., 2017. “The Curious Case of ‘Schools’ of IR: From the Sociology to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4, pp. 429-454. doi:10.1093/cjip/pox013
- Zhou, F. 2011.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pp. 147-178. doi:10.1093/cjip/por005